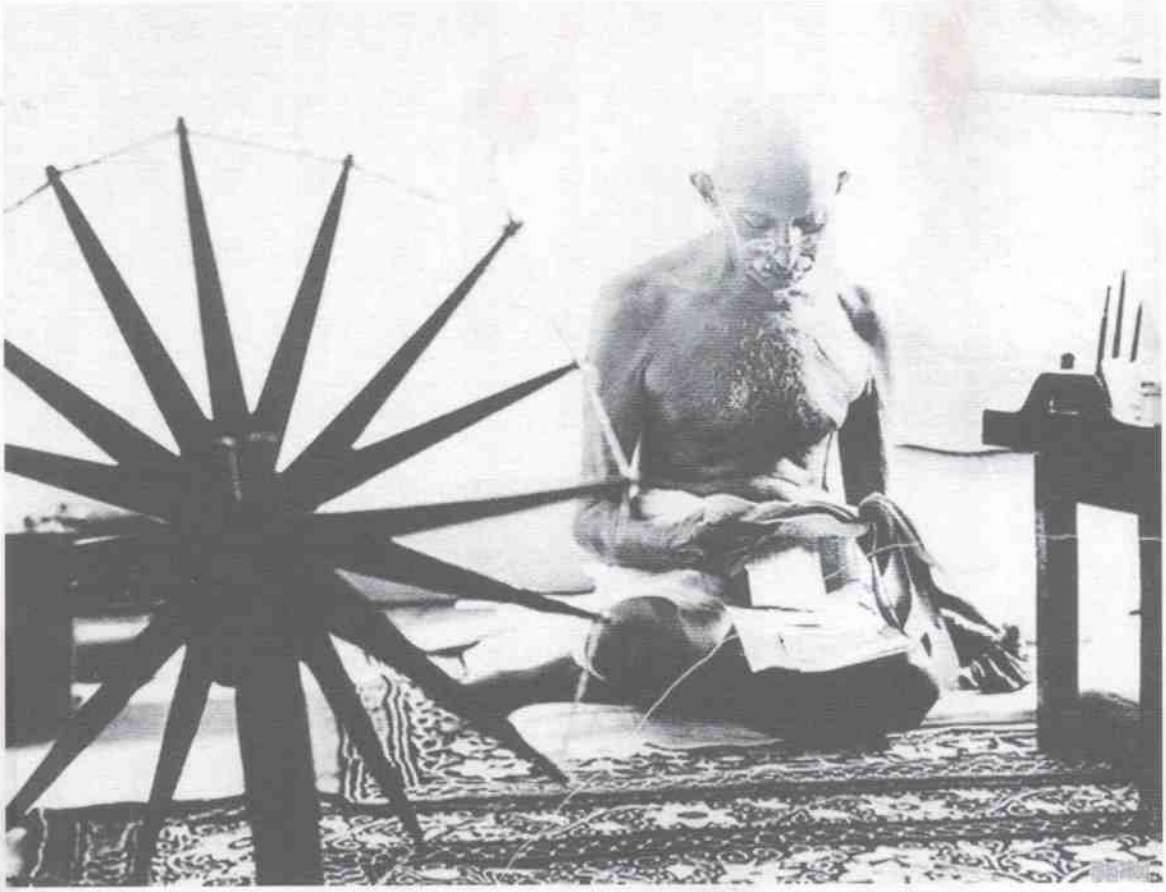
Bernard Imhasly
◎贝尔纳德·伊姆哈斯利/著　◎王宝印/译

告别甘地

——现代印度的故事



在今日崛起的印度，甘地还是其灵魂吗？这部印度报告文学，将是你了解印度的第一步。

资深驻印度记者Bernard Imhasly带您探索印度的历史痕迹，导游是甘地，聚焦于印度的“当今”和“当地”。在繁荣的都会区，造访已经形成的新时代中产阶级；在偏僻乡镇，见识仿佛生活在远古时代的人们。每个不同的人告诉你甘地和印度的未来。

Abschied von GANDHI

人民日报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bschied von Gandhi

告别甘地

——现代印度的故事

“我要用这种方式，从根本上动摇庞大的大不列颠帝国的根基”。

甘地动员了本国三亿同胞起来反抗，他从根本上动摇了大英帝国的基础，他奉行的政策，是二百年以来对宗教最强有力地推动。

甘地的天赋主要不是表现在他具备圣人的品质，而在于他的组织技巧，以及能够把大量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集聚在一起的能力。

时代在改变，人人都必须要迎合这种变化。甘地曾经一再强调这一点：要坚持你自己的原则，但同时也要不断调节你的计划和战略。甘地的信徒们把甘地给冻结了，他们自己也变成了历史的遗物。

检验一个政府领导得好不好，不是看这个国家百万富翁的人数有多少，而是看这个国家能不能消除贫穷和饥饿。

我们想达到什么目标，我们就必须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地改变自己。

世界就是我的家。

战胜希特勒的胜利，并没有完全使欧洲摆脱种族主义。原则上来说，是甘地帮助英国结束了种族主义的殖民制度。种族主义是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邪恶势力。在印度，甘地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战胜了种族主义；在欧洲，英国、后来再加上美国，也是这样做的。

ISBN 978-7-80208-811-5

9 787802 088115 >

定价：24.00元

告别甘地

——现代印度的故事

Abschied von Gandhi
Eine Reise durch das neue Indien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别甘地——现代印度的故事/贝尔纳德·伊姆哈斯利(Bernard Imhasly)著;王印宝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4
ISBN 978-7-80208-811-5

Ⅰ.告… Ⅱ.①伊…②王… Ⅲ.游记-作品集-瑞士-现代 Ⅳ.I516.65

中国版本国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213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9-2156 号

Bernard Imhasly,Abschied von Gandhi?Eine Reise durch das neue Indien
©Verlag Herder Freiburg im Breisgau 2006

书 名:告别甘地——现代印度的故事

出 版 人:董 伟
著 者:贝尔纳德·伊姆哈斯利(Bernard Imhasly)
译 者:王印宝
责任编辑:田玉香
封面设计:孙希前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65369530
编辑热线:(010)65369525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郑庄宏伟印刷厂

开 本:170mm×240mm 1/16
字 数:179 千字
印 张:11.25
印 数:2000 册
印 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08-811-5
定 价:24.00 元

序

凡是以印度为题材的书籍，想必其作者都熟悉“印度斯坦五个盲人”的故事。这则古老的寓言讲述的是五个盲人同时触摸一头大象，他们摸到的身体部位不一样，因此对这种动物得出的概念也不尽相同。

任何一本有关印度的书籍，即便其作者没有受到对印度茫然无知的指责，没有人批评他们如同盲人摸象，对印度仅仅看到一个侧面，而忽视了它的整体；但是横卧在南亚次大陆的这头巨象的庞大身躯，远远地超越了任何一本书的范围，任何一本书都涵盖不了这个庞大国度的丰富内容。

印度国土幅员辽阔，它的总面积达到 330 万平方公里。这个面积相当于南起非洲北部的突尼斯，一直向北延伸到位于挪威最北端的北岛，东起俄罗斯的乌拉尔，西到爱尔兰。在印度不同面值的纸币上，印的全是同一个人的肖像，这个人就是圣雄甘地。所有的卢比纸币，其中包括 100 卢比，都用 17 种法定语言文字印明票面，其设计异常精美。在印度，文化的多样性，社会、经济和宗教的冲突，众多的人口，复杂的人种，可以跟任何一种普遍性进行抗争。在这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例外便是规则，任何一种事实，都可以找到与其正好相反的实例。

这本书里所记述的旅行，原本可以是去其他什么地方，去看看其他的人和风景，也原本可以写一些其他的主题，比如：奥里萨邦的采矿业与种族文化的冲突，或者是泰米尔纳杜邦那些古老的政治部族之间隐藏在温情优雅幕后的血仇和明争暗斗，或许还可以写一写孟买如今展现出来的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以及它的破坏力，或者是喀什米尔地区 15 年来因占领军驻守所经受到的创伤和困境。这样一些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道，如同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这本游记一样，写的全都是事实，也同样只是一些片段。

这期间我所做的种种观察，都聚焦在甘地[1]这位历史伟人身上。这或许让某些读者感到有些诧异。甘地在印度独立后仅仅活了不到半年[2]，在甘地去世后，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并没有沿袭他所制定的路线发展，而是野心勃勃，梦想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尤其是在核武器方面。它历尽艰辛，克服了社会上的种种挑战，近 15 年来，印度开始实施经济开放政策，这使印度有望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印度曾经执行过 40 年的社会主义路线，但以失败而告终。这一回它不再依靠国家机器，而是要借助于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

印度正以一种崭新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描写一个新印度的种种景象，不是更加令人兴奋吗？这个合理的愿望只有一点不足：在 2006 年以前，这个愿望只能是一种憧憬。可以肯定地说，印度的觉醒和兴起是真实的。自从独立以来，一个执行民主政策的印度，终于有可能不再依靠暴力进行变革，而继续获得蓬勃发展。但印度是否真能如众人所愿，将会走上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吗？它是否在重复其他许多发达工业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这个种族繁多的国家所展现出的生命力确实令人惊讶，在它的国民中，几乎有一半是 20 岁以下的年轻人，再加上人民中间蕴藏的巨大能量，这一切都有理由使印度充满希望。但也有另外一些场景不容轻视：同时出现的人口爆炸和不切实际的期待，由于市场经济造成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自然资源的匮乏，大象对其生存环境的践踏——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些没有历史先例可借鉴的因素，因此无法预测未来的后果。

不过本书不想展望印度的未来，而只想聚焦于印度的“当今”和“当地”。为了避免捕捉到的只是瞬间抓拍到的印象，我把“当今”定位于印度近代史的范畴，把“当地”定位于印度广阔的国土和广泛的社会。在《告别甘地》这本书里，将要报道的是在当今印度的旅行，而我选择的导游是甘地。

为什么我偏偏选择甘地？因为甘地影响了整个印度的命运。在 20 世纪的印度，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与他相提并论。为了对整个国家进行实地考察，他走南闯北，

译注①：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1948），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领导者，被印度人民尊为“圣雄”和“国父”。

译注②：印度于 1947 年 8 月 15 日独立，1948 年 1 月 30 日甘地被一名激进印度教教徒枪杀。

四处游历，足迹遍布印度的各个角落，没有一个印度人不为此折服。甘地对这个国家的影响之大、影响之深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形象为印度社会各个阶层和种族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折射平台，由此反射出的，是对一个国家的认同，是各个阶层和种族的息息相关。甘地的功绩远远不止这些。他发现了印度文化在促进人类文明方面所独具的种种特性，并且将这些独特性转化为具有现代色彩的语言：简朴的生活具有崇高的价值；政治上要以精神为支柱；对任何一种影响力都保持怀疑态度，不管这种影响是来自国家、还是来自市场经济；根据社会需求，安排个人的生活规划；善待一切生灵；弱小的社会组织和机构，应该优先于那些庞大的社会组织和体系——这一切都扎根于印度的传统思想，并且已经根深蒂固。而今天，多亏了甘地，这些传统的思想理念才得以传承，并继续保持着重要地位。

但是，甘地所揭示的思想理念，能比甘地本人更具有生命力吗？它们能体现印度独一无二的文化吗？印度是否有能力，把这些思想理念和道德准则引入到全球化的论战中去？印度是否能够代表亚洲文明，在一场几乎无一例外地由西方国家主宰的全球化大讨论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本书里，将要逐一探讨的正是这些问题。本书将力图让人们听到，甘地的声音在当今印度的回响。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部写印度的书，而不是介绍甘地的书籍。如今，甘地的思想理念，正在与一些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进行较量：贫穷的烙印；暴力的作用；各种社会团体及宗教组织的和平共处；职业的尊严；人与环境的关系——这些问题80年以前就存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这些问题与人以及各种地理环境的较量，也是本书的一个主题。

敢于通过对一个人的观察，来反映整个次大陆，理解次大陆，这种做法未免过于大胆，而且也很困难。印度是一头后起急追的大象。长期以来，它沉溺于自己的庞大与沉重之中，现在它毅然站立起来，奋起直追，而且从起步开始，一直保持着极高的速度，任何人想要抑制住它的脚步，犹如螳臂挡车，已经难上加难。印度如今是一个"moving target"——一个不断移动的靶子，变化迅速，虽然在许多方面依然如故。印度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又在哪些方面保持着原状？要想对此最终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并非易事。一本书想要解决这个难题，唯一的办法就是信奉自己的主观观察和判断。因为印度不仅是一个活动的靶子，而且它也是一个令人思考的靶子，一个令人心动的靶子。观察者被他接触到的人和事物所感动，其看法也会随之改变。

《告别甘地》记述的是在印度的旅行。每一次旅行都是不断地与各种不同的人相遇的过程，这本书能够得以存在，首先要感谢这些旅行途中的偶遇者。我还要感

谢另外一些人，在我将这一系列的相遇转变成文字的过程中，他们一直陪伴在我左右，不断地给予我鼓励，给予我批评和建议。他们无私的帮助理应得到我的敬谢。我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以至无法在这里一一列出他们的姓名。虽然我的感激之情是针对他们每一个个人的，但是囿于篇幅，我却只能泛泛地说一句：谢谢大家。我对所有的人都心存感激。

不过有一些人的姓名和有些机构的名称，我仍然想在这里逐一提及，是他们使我的印度之旅能够轻松成行。我要感谢《新苏黎士报》，准许我暂时停止在报社的工作，为我的印度之行提供了时间上的保障。我还要感谢安德烈亚斯·赖因哈特和福卡特基金会，以及巴尔巴拉·菲舍尔和埃贝哈德·菲舍尔，他们在我暂时停止工作期间，为我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我也要感谢我的印度家人，尤其是我的妻子拉什娜，她一直扶助我，支持我，帮助我。

仅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以及我生命中的另外四个女性 —— 奈拉、阿妮莎、玛丽－路易泽和柯赛德。

qian yan

前言

我这次探访甘地故里的旅行是否能够吉星高照，进展顺利？在飞往古吉拉特邦的班机上，我阅读了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①]的名言录。他说，如果他到印度旅行，那只不过是一次常人所做的普通旅行；但假如他有机会前往古吉拉特邦，拜访甘地的出生地，那将是他以圣徒的身份所进行的一次朝拜圣地之行。我的这次朝圣之行，始于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的机场。步出机场大楼，等候在楼前广场上的一群出租汽车司机立刻蜂拥过来，激动地朝我打着手势。巡视片刻之后，我把目光移到一个男子的脸上，久久地注视着他。他立刻挤到我的身旁，一把夺过我手中的箱子，然后步履笨重地领着我走出人群，我紧跟在他身后。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并没有走向出租汽车停靠站，而是绕过新的机场大厅的建筑工地，走出机场区，越过一处差不多已经被踏平的篱笆缺口，来到一辆车身到处坑坑洼洼的三轮出租车前。我没有别的选择，只好上车，暗自希望他能及时地将我运送到位于城市南郊的公共汽车站，因为我要从那里搭乘班车，前往博尔本德尔。

我乘坐的三轮摩托车没有驶上超车道，而是一路上发着突突声，从容不迫地沿着街边地向着市中心的方向开去。途中我见到三个青年男子，正坐在一棵树下的草地上凝神修炼。他们盘着双腿，紧闭双眼，右手手指按捏自己的鼻梁。他们是在练习"Pranayama"，这是一种瑜伽调息法，在印度非常盛行，又称呼吸冥想法。不久我们又经过一个军营，这是殖民地时代留下的产物。如同许多遗留下来的外国军队驻防地一样，这些军事基地如今已经变成城市人口密集地区的绿肺。军营里一个高尔夫球场上，如茵的绿地边缘蹲着一个妇人，她的头部被黑纱遮住，双手正在忙碌着。她

译注①：马丁·路德·金（1929–1968），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196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遇刺身亡。

把一团团牛粪拍成一个个宽大的圆饼，并把它们摊放在自己周围的空地上晾晒。她还没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又突然出现了一男一女，这是两个一大清早就来练习高尔夫球的人。他们与自己的球童站在草坪上，那位女子正挥起球杆，准备击球进洞。

这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当初登上这辆三轮出租车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这个车夫算是做对了。三轮摩托车虽然速度慢，然而正是这种慢，让我领略了意想不到的风土人情。

艾哈迈达巴德是古吉拉特邦最大的城市。我打算从这个邦的最西端开始这次行程，即把博尔本德尔作为旅行的起点站，因为位于索拉什特拉沿海地区的海滨城市博尔本德尔，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出生地。我希望这次旅行是一次历史与心灵相结合的新印度之旅。之后，我还会返回艾哈迈达巴德。所以，在到达艾哈迈达巴德的当天早上，我对这座以一个很大的黑点在地图上标出的名城只是匆匆一瞥。接着，我们途径一个由环形交通线环绕的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高达三米的雕塑，那是甘地的一双手，手上布满了皱纹。当我们经过旧城区的时候，一座拱形红门映入眼底，这就是有名的“拉尔奎拉”。红门通向伊斯兰教群众历史居住区。我上次旅行曾经到过这里。那一次也跟今天一样，街上几乎没有任何车辆。当时我听到枪声四起，看到警察蹲在拱门下正端枪瞄准，一个骑自行车的过路者正拼命蹬着自行车逃向安全地带；向远处望去，可以看到一群暴民站在街头，他们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有的手中拿着铺路的石块，有的握着铁制的棍棒。这场严重的骚乱发生在2002年5月，是印度教派中的极端分子对伊斯兰教群众发动恐怖袭击引起的。

如今呈现在眼前的街道是一幅和谐宁静的画面。我看到有的人坐在茶座里，一边喝着早茶一边看报，有的人则在尚未开门营业的店铺前擦洗门窗，三三两两一袭白装的青年男子飘然而过，他们要赶往清真寺做祈祷。在萨巴尔马蒂(Sabarmati)河对岸是新城区，现代而富足。据我所知，新城区完全控制在印度教派手里。

我在关键的一刻到达了汽车站。当时，车站售票员刚刚收起摆在人行道上卖票时用的小折叠桌，正招手示意准备让司机开车。汽车启动后一直向南行驶，越过郊区，途径尤哈普拉小镇。自打2002年起，一座高达五米的隔离墙将这个小镇划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冠名为“小巴基斯坦”和“斯林南达纳加尔”。从此，伊斯兰教派和印度教派两个种族的居民被彻底分开。当我们的汽车拐入环形大道时，我突然发现，在一片旷野中居然有灰尘满布的停车场和堆放着建筑材料的工地。一座座崭新且极富魅力的建筑物拔地而起，其中有大型购物中心和多功能电影院，都采用了最具

有现代感的玻璃和金属结构。可是这种景象转瞬即逝，接下来的景色变得既单调又灰暗。随着车内气温的不断升高，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片岩石地带。

索拉什特拉半岛就像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口袋，从西部沿岸伸入到浩瀚的印度洋中。强劲的海风从这个地区吹过，带走了地表的腐殖质层，给当地留下一片贫瘠的土地。这里的干旱只能靠东南亚季风雨来调节，季风雨一年一次，多年以来年平均降雨时间从未超过100小时。当季风雨铺天盖地而来时，索拉什特拉地区常常会洪水泛滥。由于这片土地缺少腐殖质层，无法吸收雨水，造成索拉什特拉地区长时间严重缺水。这里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作物可以生长，而且好像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在这里生存。然而我在途中却一再看到，三五成群的妇女出现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她们或者蹲在地上，在地上挖来挖去，或者集聚在马路边，把大石块敲成一堆堆铺路的碎石。有时候，可以远远地望见一队妇女，头顶水罐，鱼贯而过。她们一律穿着印度传统服装，五颜六色，舒展艳丽，无论是朱红、靛蓝，还是青黛、向日葵的金黄色，这些斑斓的色彩交织在一起，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们展示着一种闪光的力量，传递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就好像是在向这片与人类为敌的土地进行挑战。

此间，满载乘客的汽车里放起了电影，音箱里发出的隆隆声震耳欲聋。我没有看这部影片，而是决定抓紧时间研究一下有关甘地的笔记和剪报，这些资料是我花费一年的时间收集的。我想在到达甘地的出生地之前做些准备。我一边望着窗外频频闪过的荒凉景象，一边暗自思索：一个如此伟大的人物，为什么偏偏出生在这样一个荒芜的地区？而且，不但现代印度的缔造者曾经在这里生长，巴基斯坦的开国创始人也生长在此地，两个伟人同出一地，这又意味着什么？也许这些资料有助于解开我心中的疑团。同甘地一样，穆罕默德·阿里·金纳也诞生于索拉什特拉。根据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他们两个人都出身于商人阶层。他们都早早地离开了古吉拉特邦，奔赴英国，在伦敦学习法律。两个人归国后都在孟买定居过。后来，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导致了南亚次大陆的痛苦分裂。1947年8月，身为无神论者的穆罕默德·阿里·金纳，创建了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深深信奉印度教的甘地，则冒着生命的危险，致力于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把国家权力归还给俗人。

我从2005年10月2日的剪报资料开始看起。10月2日是伟人甘地的诞辰日，是印度的一个法定假日。每年的这一天，各种新闻媒体都不失时机地推出甘地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刊。当多数由国家主宰的报刊宣传文章如奉神明，对“国父”顶礼膜拜、歌功颂德的时候，一些反对派则大唱反调。他们在报刊上撰文，对甘地展开猛烈批评和攻击，其肆无忌惮令人震惊。《甘地还招人喜欢吗？》，刊登在《印度时代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这样露骨地问道，其语气之不恭和随便，就如同年货市场上的小贩在兜售商品。紧跟其后的是回答，以及一幅经过特殊处理的照片。呈现在照片上的，是甘地圣像上戴着的那副具有标志性的钢架圆眼镜，不过眼镜片已经破碎，四处洒落的玻璃碎碴占据了整整半个版面。《印度斯坦时报》在该报的头版上也刊登了一幅照片，画面上是一座矗立在班加罗尔市街头的甘地半身像，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大块抹布，正在对这座巨大的塑像进行擦洗。但是这张照片给人的第一眼感觉却是，他是在为圣雄甘地擦拭脸上的眼泪。《亚洲时代报》上的一张照片对甘地更加不尊重，出现在照片上的居然不是甘地本人，而是在影片《甘地》中扮演甘地的演员本·金斯利，他旁边簇拥着一群袒胸露背的美国女影星。照片上方的大标题是，《甘地已经没有市场了》。

不过在报刊文章中，也有一些作者表达出一种自我反省、自我批评的精神，比如印度电影演员阿努帕姆·凯尔，他在一部题为《我没有暗杀甘地》的影片中首次出演主角。阿努帕姆·凯尔看上去是在继续本·金斯利那张照片的话题，他回忆起印度一位著名漫画家的一幅漫画，画面的内容是：有人给一个年轻人看一张甘地的照片，并且问他，这是谁；年轻人竟然回答说：“本·金斯利”。阿努帕姆·凯尔在文章中质问道：“今天，对于我们而言，究竟谁是甘地？难道甘地只是印制在邮票上的一尊头像，或者是出现在纸币上的一个人物？难道他仅仅是一个坚持非暴力立场、并把非暴力打造成强大武器的人？难道我们今天还能想起他，只是因为他的生日为我们多提供了一个法定假日、让我们多休息一天？对于我们当今每一个印度人来说，自由已经是一种顺理成章的权利，难道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集体按下删除键，把带给我们自由的人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

《印度时代报》认为，甘地的许多愿望至今还没有实现。该报驻比哈尔邦的通讯记者在首府巴特那找到一名姓氏也为甘地的男子，他原本出自“梅塔尔”这个种姓。按照印度种姓制度的严格规定，“梅塔尔”们只能从事“不洁”的行业，比如掏茅房。他们必须每天一大早上门，用手为雇主清除茅厕的粪便。1993 年，印度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明令禁止这种有损于人的尊严的职业。然而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人在从事这一行当。仅仅在比哈尔邦，就有 22 000 个掏粪工。本属于梅塔尔种姓的掏粪工甘

地，千方百计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想起了改名换姓这一招。他试图以此摆脱低贱的职业，然后开设一个茶摊，使自己的人生能够有一个新的开端。让他没有料到的是，他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种姓制度已经在他身上刻下深深的烙印，他虽然可以把姓氏改换成“甘地”，但没有一个人愿意让一个“扫除污物的人”用掏过大粪的手为自己斟茶。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又回到祖祖辈辈所从事的有辱人格的行业。

今天，无论是种姓制度，还是历史伟人甘地，似乎都已经从城市青年的视野中渐渐退去。有一名年轻的经理，他来自众多新兴产业之一的移动通讯客户服务中心，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我们仍然继续推行提倡国货、抵制外国货的政策，我将永远不可能得到这么好的一份工作，也永远不可能挣这么多的钱。”

他这里指的是闭关自守的政策，这项政策在印度已实施长达 40 年之久。印度现任总理曼莫汉·辛格说，“提倡国货、抵制外货”跟闭关锁国和排外没有任何关系，这样做纯粹是为了实现民族自决和经济上的独立。遗憾的是，辛格在甘地诞辰纪念会上发表的这番讲话，绝大多数报刊根本没有刊登。辛格认为，在世界实现全球化的时代，要想确保独立自主政策在本国得以贯彻执行，最有效的途径便是建立与各国的关系网，相互依存，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我在德里参观甘地纪念馆时，曾看到过甘地的一句名言：“愿世界各国文化像一股新鲜的气流吹向我的家乡，但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一种异国文化把我随风卷走。”我倒觉得，辛格在讲话时，本可以援引圣雄甘地的这句名言。

为了吸引住那些对甘地不感兴趣的城市青年，有些报刊和媒体想方设法，投其所好。他们用一种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表明，甘地在国外仍然享有神圣的地位，受到狂热的崇拜。有一家报社向青年人推荐一部意大利电信广告短片，该短片选择圣雄甘地作为他们广告的主角，当人们在背景里听到甘地的声音的同时，可以看到甘地的面孔时而出现在意大利游客的手机上，时而出现在莫斯科红场和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时而又出现在华尔街银行家的笔记本电脑上，接着，又“现声”在一个中国男子的随身听里，最后出现在足球场上面对成千上万球迷的大广告牌上。短片结束时提出一个问题：“假如甘地能够这样与人交流，大家设想一下，今天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

我乘坐的汽车已经越过索拉什特拉干旱的大草原。当我离与世隔绝的甘地故里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也开始思索起这个问题“假如……会怎么样呢？”对此的想象

非常诱人，甚至胜过甘地本人。甘地一直坚持苦行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一个禁欲者；然而他却是20世纪的媒体大师之一。甘地一向重视媒体的宣传作用，他不但仔细斟酌，如何通过媒体把自己的信息传递出去，而且还深知，在传递信息的同时，需要配上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让人们在不经意之中就能铭刻在心里。他或缠着自织白色土布围腰和披巾、面带微笑，或独自一人坐在纺车前、纺纱织布，或拄着拐杖跋山涉水、四处奔波，或俯身抓起一把食盐、撒向人群——这一系列的精彩镜头，都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2005年春季，为了纪念甘地领导的食盐大进军75周年，印度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人们以此为契机，再一次对甘地展开宣传，赞扬和肯定他的独特人格。发生在1930年的食盐大进军是一场抵制食盐专营法的运动，这场运动为最终推翻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打响了第一枪。甘地当时没有听从党内同志的劝告，他们有的提议在新德里举行游行示威，有的主张建立反对派政府。甘地决定，不惜任何代价，组织一次远征。他们长途跋涉，来到位于古吉拉特邦南部的一个不出名的小渔村。甘地俯身在海滩上抓起一把盐撒向人群，以此破坏英国殖民当局对食盐的垄断。他公开违抗殖民政府法律，揭露法律的不公正，抗议统治者借助征收食盐，把大自然的产物据为己有。

甘地的战友开始质疑甘地的判断能力，新闻界也对他大肆讽刺和挖苦。英国驻新德里的总督甚至认为，再也没有必要对甘地进行保护性拘留。然而甘地没有简单地跑向最近的海滩，对于那时已经60岁的老人而言，远征才是他的又一个目标。丹地海滨距离他在艾哈迈达巴德的居住地艾斯赫拉姆有385公里。他要在三周内，徒步走完这段路程。当他到达丹地时，原本78人的队伍，已经增加到好几千人。成千上万的民众，围拥在街道两旁，为他们呐喊助威。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曾经嘲笑他只有一小撮追随者，但最后，他们不得不对甘地心悦诚服，认真地对待甘地的每一句话。1930年4月6日清晨，甘地从海滩上抓起一把食盐，然后大声宣布："我要用这种方式，从根本上动摇庞大的大不列颠帝国的根基。"甘地讲这番话时带着一点点幽默，也带着一丝自嘲。不过这期间，印度总督脸上却失去了笑容。这一年年底，《时代》杂志推选甘地为当年的"年度人物"。为期三周的食盐大进军阵容越来越强大，无数报刊纷至沓来进行专访。这一行动导致大约500万印度人抵制殖民当局颁布的食盐法。超过上万名活动分子被逮捕入狱，其中也包括甘地。但一切镇压为时已晚。随着开展向丹地食盐进军，印度走向独立的漫漫征途，进入了最后一个历史阶段。但历史总是在嘲弄人，就在同一年，传来了这样一则消息：著名的诗人阿拉

玛·穆罕默德·伊克巴尔[①]，在拉合尔也第一次提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基斯坦国的主张。

上面提到的那部意大利电信广告短片，是在2004年拍摄的，它提出了一个非常实在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却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因为当时，不止这一家意大利电信公司强行使用了甘地的圣像。世界各地的广告公司好像一下子都发现了他。甘地的格言和他那具有明显特征的肖像——光头，招风耳，圆框钢架眼镜——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品牌标识。被采用的肖像其大小或者超过真人，或者能印在T恤衫上。微软公司和苹果公司都使用了他的名言"Think Different"[②]。好莱坞巨星詹尼佛·安尼斯顿，为了化解其前夫布拉德·皮特的离去给自己造成的痛苦，特意穿上一件印有甘地格言的T恤衫，这条信息是我从放在膝盖上的剪报材料中看到的。

除了那些轻松的新闻报道之外，也有一些严肃的教诲和名句，我在阅读甘地的资料时摘抄过这样一些名言名句。法国小说家罗曼·罗兰曾经惊叹道："甘地动员了本国三亿同胞起来反抗，他从根本上动摇了大英帝国的基础，他奉行的政策，是二百年以来对宗教最强有力地推动。"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③]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甘地的强势在于，他是一位先知，一位愿意生活在政治贫民窟里的先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是我在参观甘地纪念馆时抄录的。这位基督教牧师写道："甘地也许是历史上第一位将耶稣的仁爱道德观超越个体之间的关系、升华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的人。"最后还有核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贝格[④]那段奇特的评价："在西方，我们建造了一艘漂亮的巨轮，它拥有舒适的现代化设施，但却缺少一样东西：它没有罗盘，不知道该驶向何方。像泰戈尔[⑤]和甘地这样的人找到了罗盘。为什么这个罗盘不能安装在我们的轮船上呢？这样双方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目标。"

译注①：阿拉玛·穆罕默德·伊克巴尔（1877—1938），印度（现巴基斯坦）著名诗人、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在1930年全印穆斯林阿拉哈巴德年会上提出了在印度西北部建立穆斯林独立国家的思想，这一思想成为巴基斯坦的立国之本，因此他被称为巴基斯坦"精神之父"。

译注②：1980年到1990之间，苹果计算机公司委托TBWA广告公司策划了一个广告活动，主题就是"Think Different"（不同凡"想"），采用了一系列历史伟人肖像揭示了苹果的不凡理念，其中一幅是甘地的肖像。

译注③：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3），是当代影响最大的英国史学家之一。长期担任伦敦大学教授，还担任过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研究部主任与外交部研究司司长。

译注④：维尔纳·海森贝格（1877—1938），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因创立量子力学而荣获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译注⑤：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印度诗人、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

现在，这个罗盘仍然在继续指引道路吗？

甘地为印度人民指明了道路，他达到了他既定的政治目标。但是，一个孕育着希望的国家分裂了。甘地毕生致力于印度境内两大教派——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和平共处，但收效甚微，印度最终分裂成两个国家。1947年8月15日，印度宣布独立，5个月以后，一个名叫纳图拉姆·戈德森的印度教极端狂热分子，开枪将甘地杀害。甘地的第二个人生规划——消除种姓歧视取得的成果也非常有限，出身于"梅塔尔"种姓的掏粪工的命运，就是一个证明。甘地踌躇满志的目标——使道德与精神生活成为社会和政治解放的组成部分也一直没有实现。至少，当人们把"腐败系数"看作是衡量一个国家道德精神生活的标准时，就不难发现，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把甘地的学说与发生在21世纪的自杀性爆炸袭击事件相比，会是什么结果呢？在甘地诞辰136周年纪念日的前三周，伦敦的公共汽车和地铁发生了三起自杀性爆炸袭击事件。当一辆满载着乘客的公共汽车行驶到伦敦市中心，在达维斯托克广场停靠时，一枚炸弹被引爆，炸死了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和另外12名无辜群众。达维斯托克广场类似于伦敦的和平广场，1968年，一座甘地塑像在这里揭幕（1888年甘地开始在广场对面的伦敦大学学院攻读法律）。一年前，人们在达维斯托克广场种下一棵纪念树，以纪念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死难者。为了向许许多多拒绝参战的无名之士表示敬意，广场上还竖起了一块巨石。

历史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副教授维内·莱尔，曾经以这种碰撞为契机，将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与自杀性爆炸袭击事件进行对比和思考。他认为，暴力拒绝进行对话，而甘地的非暴力恰恰是不懈地寻求与暴力对话。莱尔提到1899年爆发的布尔战争[①]，作为甘地首次在南非进行的一系列非暴力"试验"，他以文明的不服从，对抗当时当地政府所推行的种族政策。那时候他还是大英帝国一个坚定不移的追随者，然而非暴力"试验"并没有阻碍他积极投身到这场维护帝国利益、反对布尔人的战争中去。"在暴力面前，甘地没有逃跑，也没有被暴力吓倒。"他以救护员的身份奔赴战场，他召集印度志愿者，组建了一支野战救护队，主要为受伤的黑人士兵提供救治，因为英国士兵拒绝救治他们。

莱尔认为，自杀性爆炸袭击者的所作所为，是拒绝和平对话的一种最极端的方式，它同时炸死的是原本有可能进行对话的双方，即实施暴力的自杀性爆炸袭击者

译注①：布尔战争(1899—1902)，英国殖民者与荷兰殖民者后裔布尔人为争夺南非殖民地所进行的一场战争。又称英布战争、南非战争。

和手无寸铁的非暴力公共汽车乘客。莱尔问道，如果甘地还活着，他会怎样面对自杀性爆炸袭击现象和这类极端分子的挑战？一种典型的甘地式回答，莱尔说，很可能以此开头：先认同他们的暴力行为，接受这种潜藏于所谓的无暴力文明社会中的暴力行为。因为在20世纪，几乎一意孤行、坚持非暴力手段的，不是只有甘地一个人吗？甘地学说所面对的，是暴力手段捍卫者组成的严密阵线，而站在这个阵线前沿的，不恰恰是那些在西方被人熟知、甚至备受欢迎的人物吗？无论是托洛斯基、法农[①]、卡斯特罗、切·格瓦拉[②]，还是20世纪的大屠杀者们。莱尔还问道，恐怖主义分子所采用的极端暴力手段，不是也堂而皇之被西方社会暴力文化广泛认可和接受了吗？只需要想一想如今的电影节目和供应的录像片，想一想当今的电视系列片和电脑游戏，就可以得知，如果不是整个社会对暴力充满幻想，如果不是整个社会对暴力行为的认同和接纳——这里暂且不谈社会对战争的容忍和接纳——自杀性爆炸袭击者的暴力行为也许就不可能发生。

我在汽车里读着维内·莱尔的评论文章，此时此刻我再一次意识到，我现在身在何处。我突然想起，在食盐大进军纪念日过后不久，印度人民党领导的古吉拉特邦政府，曾在报纸上登载过整版广告。广告上是甘地那张著名的照片，他手拄拐杖，正率领"食盐大进军"的队伍踏上征途。可是照片旁边的文字说明，却把"拐杖"变成了"警棍"。上面还写道：跟甘地一样，以纳仁德拉·莫迪[③]为首席部长的古吉特拉邦政府，同样重视法律和秩序，必要的话不排除使用暴力。对于许多持批评意见的印度人来说，纳仁德拉·莫迪摆脱不掉跟2002年古吉拉特邦屠杀穆斯林教派群众的干系，如果说他不是幕后策划者，那么那次种族大屠杀起码也是由于他的纵容造成的。

两个月以后，古吉拉特邦的宗教冲突依然不断发生。这时候古吉拉特邦政府又刊登了一幅广告，广告上是四位古吉拉特邦名人的肖像，其中也有纳仁德拉·莫迪。这幅广告是为了庆祝古吉拉特邦的"邦独立日"而制作的。排在广告最上方的，仍然是甘地的照片，旁边还引用了这位伟人的一句名言："暴力不是懦弱的挡箭牌，它是

译注①：弗朗兹·法农(1925—1961)，出生于拉丁美洲的马提尼克，精神病医师、政治家和作家，他认为暴力革命是第三世界结束殖民压迫和文化创伤的唯一途径。其著作《黑皮肤，白面具》、《全世界受苦的人》、《为了非洲革命》等，被认为是有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黑人解放斗争的经典著述。

译注②：切·格瓦拉(1928—1967)，出生于阿根廷的革命者，曾任古巴游击队领导人，并在古巴卡斯特罗政府担任过要职。1965后到其他国家继续策动革命，1967年被玻利维亚军队杀害。他被视为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

译注③：纳仁德拉·莫迪(1950—　　)，印度人民党政治家，自2001年以来一直连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并担任印度人民党主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